

東亞觀念史集刊 第十二期

2017年6月 頁417-450

DOI: 10.29425/JHIEA.201706\_12.0011

## 西學閱讀與清學復古

——清末民初「文藝復興」比附下的學術互動

宋 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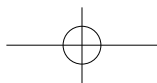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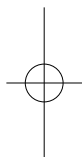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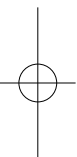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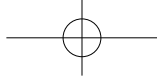
摘 要

晚清西學閱讀帶來的近代知識譜系構建，影響到中國士人的知識視野和價值判斷。他們尋找中西相通之處，由比附衍生出西學中國化的新路徑。“Renaissance”最早由傳教士介紹到中國，馬君武、嚴復、梁啟超「古學復興」的譯名，體現了士人對「復古」層面的興趣；「文藝復興」作為「部定詞」進入辭典，在“Renaissance”的漢譯名確立背後，也有嚴復的觀念轉變。歐遊之後，由法國 Amédée Britsch 的講演，蔣方震、梁啟超對「中國的文藝復興」均有闡述，而胡適的參與和張君勱的隔空對話，體現了長期的學術互動和此話題的深遠價值。在「西方的沒落」時代，任公對「科學破產」的論說和對清學「科學精神」的強調，開啟了近代中國「科學方法」的深入思考。以「西」釋「中」，借「文藝復興」論清學復古，彰顯了西學衝擊下「反求諸己」的時代風氣和士人心態。

關鍵詞：西學、文藝復興、清學復古、梁啟超、胡適

---

\* 作者現為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博士候選人。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in East Asia*, Vol. 12

Jun. 2017, pp. 417-450

DOI: 10.29425/JHIEA.201706\_12.0011

## **The Learning on Western Knowledge and the Restoration of Qing Scholarism:**

The Academic Interaction with “Renaissance” in the Late Qing and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Xue Song\*

###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knowledge genealogy by the reading of western knowledge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had affected the Chinese intellectuals' vision of their knowledge, and their values. They sought the similarities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and put forward a new way to sinicize the western knowledge by analogy. The concept “Renaissance” was initially introduced to China by missionaries, and its Chinese translation of “*Guxue Fuxing*” 古學復興 was coined by Ma Junwu, Yan Fu and Liang Qichao, reflecting the scholars’ interests in restoring ancient ways. As a “standard scientific term,” “Renaissance” was included in the dictionary, which represents the establishment of its Chinese translation and the conceptual change of Yan Fu. After their European tour, based on the speech of Amédée Britsch, both Jiang Fangzhen and Liang Qichao had elaborated on the “Chinese Renaissance.” Hu Shi’s participation and Zhang Junmai’s response to the debate, reflected their long-term academic interaction,

---

\* Ph.D. candidate, in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at Peking University

and the far-reaching value of this topic as well. In the era of the decline of the west, Liang Qichao's comments on "scientific bankruptcy" and emphasis on the scientific spirit of Qing, opened up the deep thinking of "scientific method" in modern China. The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thoughts with with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cept "Renaissance" in western world has showed the trend of self-reflection with the influence of western knowledge.

Keywords: the Learning on Western Knowledge, the Renaissance,  
the Restoration of Qing Scholarism, Liang Qichao, Hu Shi

## 西學閱讀與清學復古

### ——清末民初「文藝復興」比附下的學術互動<sup>\*</sup>

晚清以降，西風東漸，西學閱讀深刻地影響到中國士人的知識視野和價值判斷。迥異於傳統經史典籍的近代「知識倉庫」（stock of knowledge）<sup>1</sup>的構建，帶給近現代知識分子觀察世界的更多面向。當西方概念和理論傳入中土，與傳統學術思維發生碰撞和衝突，也即引發國人在多相共呈的時代背景下讀書世界中的新思考。讀書人面對西方文明，以之為參照，設計東方文明的未來時，往往努力尋找中西學術文化的相通之處，因而常出現西方理念的中國嫁接和比附，即以「西」釋「中」，進而衍生出西學中國化的新路徑。清末民初關於「中國的文藝復興」的討論，就基於此。

這場肇始於20世紀初的學術討論，<sup>2</sup>一直延續到今天，可見其生命力。

<sup>\*</sup> 本文初稿曾於中央研究院「2015 明清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2015年12月10-11日）宣讀，蒙潘光哲研究員不吝賜教，在論文修改過程中夏曉虹教授和陳力衛教授亦多有指教，敬致謝忱。

<sup>1</sup> 此概念由 Alfred Schutz（1899-1959）提出，潘光哲：《晚清士人的西學閱讀史（一八三三～一八九八）》（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4年）有詳細論述。

<sup>2</sup> 「文藝復興」在西方也並非是一個不證自明的概念，其來源和發展有複雜的歷史。詳參 Wallace K. Ferguson, *The Renaissance in Historical Thought: Five Centuries of Interpretation*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48)；曹意強：〈「文藝復興」的觀念〉亦有梳理，見賀照田主編：《並非自明的知識與思想》（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頁381-430。而將“Renaissance”作為歷史概念，始於法國史學家 Jules Michelet（1798-1874）。詳參 Lucien Febvre, “How Jules Michelet Invented the Renaissance,” in *A New Kind of History: And Other Essays*, ed. Peter Burke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3), 258-267。「文藝復興」概念傳入中國的歷史脈絡，李長林已有系統梳理。不過，李文側重不同時段背景下文藝復興

章太炎（1869-1936）、劉師培（1884-1919）、梁啟超（1873-1929）、蔣方震（1882-1938）、胡適（1891-1962）、李長之（1910-1978）、余英時等幾代學人都曾參與和研究。正如胡適所言，「沒有與西方文明的緊密接觸，就不可能有中國的文藝復興」，<sup>3</sup>各家所言的「中國的文藝復興」這一命題，均肇始於近代西學閱讀背景下知識空間的擴張，而最終指向對中國文化的深入思考。因而，從閱讀史進入這一話題，進而探討“Renaissance”這一概念中國化歷程中的學術互動，也具有文化交流史的意義。不過，本文主要圍繞清末民初以「文藝復興」比附「清學復古」的討論展開，不擬擴大到政治史領域，更不打算將此概念借入其他學科進行發揮。<sup>4</sup>

### 一、晚清西學閱讀中的“Renaissance”

自明末耶穌會傳教士東來，歐洲文藝復興以來的科學文化就已漸次被帶入中國。在明清西學東漸的歷史中，傳教士具有相當重要的影響。據統計，僅 17 世紀，「來京的耶穌會士知名者計有 76 人，約占同時期來華耶穌會士的三分之一。」<sup>5</sup>由皇帝所召而來京的耶穌會士大多身懷一技之長，

---

文化在中國的傳播，在譯名、概念、思想方面並未展開。詳見李長林：〈歐洲文藝復興文化在中國的傳播〉，收於鄭大華、鄒小站編：《西方思想在近代中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 年），頁 1-48。按：Wallace K. Ferguson 與李長林文乃其中一位審查人建議參考，特此致謝。「中國的文藝復興」之說，始於傳教士丁韞良（William Martin, 1827-1916），1868 年，他在美國遠東學會作了題為“The Renaissance of China”的演講，並於次年發表。（William A. P. Martin, “The Renaissance in China,” *New Englander* 28 [1869], 47-68.）丁韞良所指稱的對象，是中國的洋務運動。但其聽眾和讀者，皆非中國學人，故並未引起該話題在中國的討論。

<sup>3</sup> 胡適著，鄒小站、尹飛舟譯：〈中國的文藝復興〉，收於胡適著，歐陽哲生、劉紅中編：《中國的文藝復興》（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1 年），頁 183。

<sup>4</sup> 近年來，「中國的文藝復興」指涉範圍越來越大，部分已經介入其他學科，成為概念化的指稱對象，例如王富仁提出「中國現代文學正處在中國文藝復興的一個歷史長河裡。」見王富仁：《中國的文藝復興》（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 年），頁 39。

<sup>5</sup> 歐陽哲生：〈十七世紀西方耶穌會士眼中的北京——以利瑪竇、安文思、李明

其中有專業的數學家、天文學家、地理學家、畫家、機械師、建築家等，駐京時間相對較長，雖然主要目的在傳教，但不可否認他們也帶來了西洋近世科學文化。他們的著述和譯書，帶給傳統士人全新的閱讀體驗；其對天文學、數學、地理學的介紹，成為中國傳統學術接近西方近代科學的起點。文藝復興以來的西學思想進入中國，即以此為濫觴。誠然，明末清初傳教士帶來的西學並不系統，且帶有宗教色彩，但對於沉睡的古老東方而言，其中的理性之光已經打破了黑暗。

在「禮儀之爭」引起的中西隔絕之後，19世紀，隨著基督教傳教士的東行和中西貿易的展開，文化交流再度興起。1833年，郭實臘（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1803-1851）創辦《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是為第一種在中國境內出版的近代中文期刊。作為中國士人的早期西學閱讀對象，它也「為『知識倉庫』的建立，打下了初步的地基」。<sup>6</sup>巧合的是，根據目前的資料，“Renaissance”這一概念最早介紹到中國，就在此刊：

未能印書之際，匈奴、土耳其、蒙古，各蠻族侵歐羅巴諸國，以後文書消亡磨滅。又千有餘年，文藝復興掇拾之。于本經之奧蘊，才學之儒，講解而補輯之。<sup>7</sup>

但在19世紀的中國，「文藝復興」一詞用例並不廣。1886年，總稅務司署印行了艾約瑟所譯《西學啟蒙十六種》，其中的《歐洲史略》將“Renaissance”譯為「古學重興」，<sup>8</sup>但這一譯名也未固定，在晚清對“Renaissance”的解說，稱「古學復興」者有之，稱「文學復興」者有之，稱「文學復古」、「古典復興」、「文學中興」者亦有之。20世紀初，「文藝復興」雖已見諸報端，例如《申報》1905年6月11日〈論女子教

為中心的討論》，《歷史研究》2011年第3期（2011年6月），頁27。

<sup>6</sup> 潘光哲：《晚清士人的西學閱讀史（一八三三～一八九八）》，頁18。

<sup>7</sup> 丁酉（1837）二月，〈經書〉。引自愛漢者等編，黃時鑒整理：《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頁204。

<sup>8</sup> 鄒振環：《西方傳教士與晚清西史東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頁257。

育宗旨〉一文兩次使用該譯名，<sup>9</sup>但彼時“Renaissance”的譯法仍不統一。羅志田引留學日本的蔣方震和周作人（1885-1967）的說法，並據1908年《英華大辭典》的詞條，認為：「清季中國讀書人多以為『文藝復興』這一譯法是采自日本人」。<sup>10</sup>在日語中，“Renaissance”譯作「文芸復興」，並且亦有西方和日本的比附，即「日本的文藝復興」之說，將江戶時代稱為日本的文藝復興時期。<sup>11</sup>日本對“Renaissance”的系統接受早於中國，一個有趣的例子是，辜鴻銘1902年為《（商務書館）華英音韻字典集成》（*Commercial Press English and Chinese Pronouncing Dictionary*）所作序言“Introductory Note”中提到了日本的文藝復興，<sup>12</sup>稱為“the present ‘Renaissance’ of the Japanese nation”，而這部厚達1,834頁的英漢辭典卻未收“Renaissance”這一詞條。<sup>13</sup>根據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數位資料庫（Modern History Databases, MHDB）」，德國官員赫美玲（Karl Ernst Georg Hemeling, 1878-1925）出版於1916年的《官話詞典》（*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of the Standard Chinese Spoken Language and Handbook for Translators*）是較早將“Renaissance”對譯為「文藝復興」的辭典，然而其中也保留了另外兩種譯名：

<sup>9</sup> 原文：「法國古時女子亦重僧尼教育，自十三世紀之末，始於僧尼教育之外兼施家庭教育。貴族及富民往往延聘教師以教其女子。至十六世紀之初，宗教改革、文藝復興，而女子教育之理想乃稍進。其後受人道派之影響，女學之精神益復振起。改良其教法，女子習書算、生計、醫學各科，社會上與男子有同等之地位，此為改革宗教、文藝復興之效果。」參見（作者不詳）：〈論女子教育宗旨〉，《申報》第2版，1905年6月11日，《申報》影印本第80冊（上海：上海書店，1985年），頁365。

<sup>10</sup> 羅志田：〈中國文藝復興之夢：從清季的古學復興到民國的新潮〉，《漢學研究》第20卷第1期（2002年6月），頁280、291。

<sup>11</sup> 王曉平：〈亞洲漢文學的文化蘊含〉，收於王曉平：《東亞文學經典的對話與重讀》（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年），頁144。

<sup>12</sup> 署名為 Ku Hung-ming，原文：“Dr. T. Inouye many years ago republished the work in Japan, where, I believe, it has helped in no considerable degree the present Renaissance of the Japanese nation.”見 William Lobscheid（羅布存德）著，企英譯書館增訂：《（商務書館）華英音韻字典集成》（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03年），Introductory Note。

<sup>13</sup> 日語辭典中1905年已收錄「文藝復興」詞條，參德谷豐之助、松尾勇四郎著：《普通術語辭彙》（東京：敬文社，1905年），頁284-285；早稻田文學社編：《文芸百科全書》（東京：隆文館，1909年）亦有專項介紹。按：此為陳力衛教授提示，謹致謝忱。



Renaissance, n., (Hist.), 文藝復興 部定, 文學再興, 古學再興時。<sup>14</sup>

「部定」詞是 1909 年嚴復（1854-1921）任教育部「審定名詞館」總纂時對各科名詞作出的術語翻譯，共約 30,000 條，但並未公布，赫美玲《官話詞典》收錄其中 16,041 條。<sup>15</sup>由此，將“Renaissance”定譯為「文藝復興」，實源自嚴復。不過，嚴復的譯名也不是一以貫之的。1904 年，嚴復譯孟德斯鳩（Montesquieu, 1689-1755）《法意》時，以十六世紀歐洲與古代中國相比，以此論證古典文化對學術文明的推動，其中對“Renaissance”的譯名，是「古學復興」：

復案：巫祝瞽史，常為三古之所重，而一國之典章禮樂，彼實守之。此不獨中國然也，五洲皆如是。古之欲學，必於是四者求之。至若殷之巫咸，周之史任，皆王者之輔相。歐自中葉以往，皆舍教會無學術，故明以前，外國之宰相，大抵皆教中尊宿。直至康、雍之世，法之當國者，猶用紅衣翌教之流，可以見守權之久矣。歐之開化，始於古學復興之十六世紀，西史謂之荷黎諾生思。自是之後，學問之事，普及庶民。格致哲學日精，而宗教神權日墜。又以印書肇行，民之事學，方古為易，文明之運，所由沛然莫之能御也。<sup>16</sup>

根據嚴復日記，嚴復在審定名詞館實際任職的時間為 1909 年秋至 1911 年秋，<sup>17</sup>並曾於 1911 年 8 月 12 日在名詞館見赫美玲。<sup>18</sup>由是，嚴復譯名的觀念改變，即發生在清季數年間。在西史中，“Renaissance”是一個

<sup>14</sup> Karl Hemeling,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of the Standard Chinese Spoken Language and Handbook for Translators: Including Scientific, Technical, Modern and Documentary Term* (Shanghai: 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 1916), 1193.

<sup>15</sup> 「審定名詞館」為正式名稱，嚴復日記也稱「名詞館」。關於審定名詞館，沈國威有詳細的說明，本文不擬重複展開。見沈國威：《近代中日辭彙交流研究：漢字新詞的創制、容受與共享》（北京：中華書局，2010 年），頁 447。

<sup>16</sup> 孟德斯鳩（Montesquieu）著，嚴復譯：《孟德斯鳩法意》（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 年），頁 394。

<sup>17</sup> 王棊主編：《嚴復集》第 5 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頁 1494、1511。

<sup>18</sup> 王棊主編：《嚴復集》第 5 冊，頁 1510。

總括性概念 (colligatory concepts)，是「對 1450 年到 1600 年之間歐洲社會一個融貫一致而又無所不包的解釋中所力圖總括出來的東西」。<sup>19</sup> 它被紹介到中國後，國人的關注點並不是這個包羅萬象的西方概念本身，而是晚清中國對這個「敘事實體」 (narrative substance) 的借鑒和闡發。「古學復興」、「古學再興」的譯名，體現了晚清中國人對文藝復興中「復古」層面的興趣。馬君武在作於 1903 年的〈新學術與群治之關係〉一文中，稱「西方新學興盛之第一關鍵，曰古學復興 Renaissance。古學復興之字義，即人種復生時期 A second birth time of the race 之謂也。」文中詳細分析了歐洲文藝復興的歷史背景、發展過程、內容和影響，進而論述文藝復興以來的歐洲文學、科學、思想進步，直言「科學之興，其期匪古。及今效西方講學之法，救祖國陸沉之禍，猶可為也」，<sup>20</sup> 透露出晚清受西學浸染的中國讀書人以西法救時局的期待。馬君武和嚴復向中國讀者介紹歐洲文化進程中的“Renaissance”，所比較和所期待的對象，仍是「漫漫之長夜」<sup>21</sup> 裡的中國。這種比較和判斷，也影響到讀者對西學的閱讀和想像。

20 世紀初，國粹派曾提出中國「古學復興」的問題，許守微（生卒年不詳）、劉師培、章太炎多有闡發，鄧實（1877-1951）發表於 1905 年的〈古學復興論〉系統敘述了歐洲文藝復興史並借此闡發其對中國古學復興之意義、途徑的看法。<sup>22</sup> 國粹派強調「存古」，但文中也明確指出晚清諸子學之復興受惠於西學的傳播。「本國無學，則勢不能不求諸外國」。<sup>23</sup> 回顧明季以來的西學傳播，雖落腳點在「研求古學」，<sup>24</sup> 但國粹派的觀察，

<sup>19</sup> 轉引自彭剛：〈從「敘事實體」到「歷史經驗」——由安克斯密特看當代西方史學理論的新趨向〉，《歷史研究》2009 年第 1 期（2009 年 2 月），頁 157-158。

<sup>20</sup> 馬君武著，莫世祥編：《馬君武集》（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 年），頁 173-182。

<sup>21</sup> 馬君武著，莫世祥編：《馬君武集》，頁 173。

<sup>22</sup> 章可已有詳述，本文不贅。參閱章可：〈「古學復興」的兩面：清末西史知識構成之一例〉，收於張仲民、章可編：《近代中國的知識生產與文化政治——以教科書為中心》（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4 年），頁 189-200。

<sup>23</sup> 鄧實：〈古學復興論〉，收於劉東、文韜編：《審問與明辨：晚清民國的「國學」論爭》上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 年），頁 142。

<sup>24</sup> 鄧實：〈古學復興論〉，收於劉東、文韜編：《審問與明辨：晚清民國的「國學」論爭》上冊，頁 144。

還是為後來者提供了相當的文化資源。<sup>25</sup>

「古學復興」一詞，並非晚清專為翻譯“Renaissance”所造，明末復社即有「興復古學」的旗號，<sup>26</sup>清代考據學家閻若璩（1636-1704）《潛邱劄記》中亦有：

近代圖章，力駁何雪漁而返文三橋；書家力駁董文敏而歸趙松雪，皆鑿鑿至理，古學復興，亦其一也。<sup>27</sup>

這裡的「古學」與歐西之學並無關係，晚清士人在西學閱讀與翻譯中，將“Renaissance”譯為「古學復興」、「古學再興」，實為尋求中西文化結合點的一種嘗試。陳衡哲曾提出：「文藝復興（Renaissance）的意義有兩個，一是復生（rebirth），一是新生（new-birth）」。<sup>28</sup>晚清士人以此西方概念闡釋當下中國，其潛在的用意，還是再造中國文明。

## 二、白黎許氏講演之感：梁啟超、蔣方震與張君勱的「文藝復興」觀

一戰之後，梁啟超與蔣方震、劉崇傑（1880-1956）、丁文江（1887-1936）、張君勱（1887-1969）、徐新六（1890-1938）、楊維新（1888-1968）一同赴歐考察。「在巴黎時曾請法國美術館之專家講意大利文藝復興，當時演講是由百里記錄的」。<sup>29</sup>這份記錄，就是蔣方震《歐洲文藝復興史》

<sup>25</sup> 參見鄭師渠：《晚清國粹派——文化思想研究》（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3年），本文不詳述。

<sup>26</sup> 鄒振環：《西方傳教士與晚清西史東漸》，頁259。

<sup>27</sup> 閻若璩：《潛邱劄記》，收於永瑤、紀昀等編纂：文淵閣《欽定四庫全書》第859冊子部十·「雜家類」二「雜考之屬」，卷6〈與戴唐器書〉，頁31b。

<sup>28</sup> 陳衡哲：《文藝復興小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26年），頁2。

<sup>29</sup> 張君勱：〈評梁任公《清代學術概論》中關於歐洲文藝復興、宋明理學、戴東原哲學三點〉，收於張君勱著，程文熙編：《中西印哲學文集》下冊（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1年），頁832。

一書的肇始。蔣方震自言「茲編所述，為旅歐時法國巴黎大學圖書館主任 Smédée Britch 氏所臨時講演者」；<sup>30</sup> 梁啟超也證實「百里自言此書根據法人白黎許氏講演。此講演吾實與百里同聽受，本書不過取材於彼云爾」。<sup>31</sup> 歐遊歸來之後的 1920 年，蔣方震著成《歐洲文藝復興史》，梁啟超「覺泛泛為一序，無以益其善美，計不如取吾史中類似之時代相印證焉，庶可以校彼我之短長而自淬厲也」，<sup>32</sup> 而「下筆不能自休」，「不得已宣告獨立」，<sup>33</sup> 是為《清代學術概論》，反請蔣方震為之作序，傳為美談。四十餘年後，1964 年 11 月 4 日張君勳於香港新亞書院發表了題為〈評梁任公《清代學術概論》中關於歐洲文藝復興、宋明理學、戴東原哲學三點〉的演說，重提當年在巴黎聽演講之事。雖此時梁、蔣二人俱已作古，但張君勳的隔空對話，體現了他們圍繞「文藝復興」這一話題的長期互動。

那麼，是一場怎樣的講演，引起了數位學人的共同思考呢？根據蔣、梁、張三人的記述，結合法國國立信息與文獻科學高等研究院（École Nationale Supérieure des Sciences de l'Information et des Bibliothèques, ENSSIB）的資料，「法人白黎許氏」實應為 Amédée Britsch（1878-1960），蔣方震的拼寫有誤。<sup>34</sup> 根據他的訃告所載生平，梁啟超一行遊歐之時，他是法國索邦大學圖書館員，從事歷史和文學研究，有多部歷史學著作。<sup>35</sup> 這次演講，對「中國的文藝復興」這一話題的巨大影響，或許是白黎許氏始料未及的。

<sup>30</sup> 蔣方震：〈導言〉，《歐洲文藝復興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24 年），頁 8。

<sup>31</sup> 梁啟超：〈《歐洲文藝復興史》序〉，收於蔣方震：《歐洲文藝復興史》，頁 2。

<sup>32</sup> 梁啟超：〈自序〉，收於梁啟超撰，朱維錚導讀：《清代學術概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頁 1。

<sup>33</sup> 梁啟超：〈《歐洲文藝復興史》序〉，收於蔣方震：《歐洲文藝復興史》，頁 1。

<sup>34</sup> 國內相關研究多沿襲蔣方震之誤，周月峰博士曾提示作者，蔣方震的拼寫不一定可靠。

<sup>35</sup> Marie-Thérèse Dougnac, "Nécrologie, Amédée Britsch: 15 avril 1878-2 février 1960," *Bulletin d'Informations de l'A.B.F.* (1961): 37-38. 感謝南京大學法語系黃菽笛博士在法文方面的幫助。

### （一）蔣方震：「吾此行將求曙光」

作為「文藝復興時代的典型人物」，蔣方震兼長於軍事、政論、文史，被曹聚仁比作「文藝復興三傑」中的達·芬奇（Leonardo da Vinci, 1452-1519）。<sup>36</sup> 他稱歐遊為「吾此行將求曙光」，而“The great achievements of the Renaissance were the discovery of the world and the discovery of man”，<sup>37</sup> 則為其「曙光」之旨。梁啟超在序言中說：

歐洲之文藝復興，則追求之念最熱烈之時代也。追求相續，如波斯盪，光華爛漫，迄今日而未有止。吾國人誠欲求之，則彼之前躅，在在可師已。然則此書者，吾不敢徑指為百里所得之曙光，然吾有以窺其求曙光所由之路也。<sup>38</sup>

「在在可師」，是彼時國人熱切關注西方歷史文化的重要原因。蔣方震將巴黎所聽白黎許氏之演說與在歐所見所感結合而連屬成文，系統介紹了歐洲文藝復興的歷史發展。「歷史家名之曰 Renaissance，譯言再生也，東人則譯為文藝復興」。<sup>39</sup> 其對於「今日之中國」，實有「特殊必要之原因」。歐洲「各種事業皆以文藝復興為其發祥地」，而「以中國今日之地位言」，「社會蟬蛻之情狀實與當時歐洲有無數共同之點」。由「新理性籍復古之潮流，而方向日見其開展」和「舊社會依個性之發展，而組織日見其弛緩」，中國今日與歐洲當時，實有「聲氣相求、歌哭與共之致」。由歐洲文藝復興史，可「察往以知來，丑人以律己」，啟發中國的反省精神，以期有「一震之下，萬卉齊開」<sup>40</sup> 之未來。蔣方震書中〈總論〉即提出「此蕃變運動之精神上發端則實起於復古」，<sup>41</sup> 而這場復古運動，「一

<sup>36</sup> 曹聚仁：〈文藝復興時代的典型人物〉，《蔣百里評傳》（北京：東方出版社，2010年），頁8-9。

<sup>37</sup> 蔣方震：《歐洲文藝復興史·導言》，頁6。

<sup>38</sup> 梁啟超：〈《歐洲文藝復興史》序〉，收於蔣方震：《歐洲文藝復興史》，頁2。

<sup>39</sup> 蔣方震：《歐洲文藝復興史·導言》，頁1。

<sup>40</sup> 蔣方震：《歐洲文藝復興史·導言》，頁6。

<sup>41</sup> 蔣方震：《歐洲文藝復興史》，頁8。

則復希臘羅馬之古，欲以歐洲文化，返於偶像時代，此則文藝復興也；一則復耶穌之古，欲以歐洲文化，返於原始基督時代，此則宗教改革也」。<sup>42</sup>「在他看來，『復古運動』是『對於現狀求解放』的一種『手段』，更是『改造的先聲』」。<sup>43</sup> 蔣書中所言「人之發見」與「世界之發見」<sup>44</sup> 的文藝復興精神，所謂「人類自覺」、「動諸情者與動諸知者」，<sup>45</sup> 超越了文藝復興時代而直指當下：「層層鐵甲，終不足以抗歷史之大潮，歐戰之興，聯軍之所以制勝之主因則此個性之勢力為之也」，<sup>46</sup> 由 15 世紀論及 20 世紀，用歐洲歷史論說民初中國，以是書作為自己歐遊觀感的「心影錄」。

不同於楊維新留英、丁文江赴美、劉崇傑先行歸國，蔣方震和張君勱歐遊期間大部分時間都和梁啟超同行。1919 年冬，梁啟超、蔣方震、張君勱、徐新六幾個人把巴黎西南的白魯威（Bellevue）當作深山道院，開始了各自的讀書與寫作。梁啟超所寫即《歐遊心影錄》，蔣、張、徐三人對此也有助益。<sup>47</sup> 在白魯威時，數人「鎮日坐在一間開方丈把的屋子裏頭，傍著一個不生不滅的火爐，圍著一張亦圓亦方的棹子，各人埋頭埋腦做各自的功課」。<sup>48</sup> 由梁啟超的序言，蔣方震蝸居白魯威時所做的「功課」，很可能就是對於《歐洲文藝復興史》的準備：

吾儕歐遊中，百里常昌言於儔侶曰：「吾此行將求曙光」。儔侶時輒戲詰之：「曙光已得乎？」曰：「未也」。如是者數四。及將歸，復有詰者。百里正色言曰：「得之矣」。至所得為何等，則未嘗言，吾儕亦殊無以測其淺深。及讀此書，見其論歐洲文藝復興所得之結

<sup>42</sup> 蔣方震：《歐洲文藝復興史》，頁 107。

<sup>43</sup> 潘光哲：〈《清代學術概論》導讀〉，收於梁啟超著，潘光哲導讀：《清代學術概論》（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12 年），頁 9。

<sup>44</sup> 蔣方震：〈導言〉，《歐洲文藝復興史》，頁 6。

<sup>45</sup> 蔣方震：〈導言〉，《歐洲文藝復興史》，頁 6-7。

<sup>46</sup> 蔣方震：《歐洲文藝復興史》，頁 149。

<sup>47</sup> 梁啟超：〈與孺兒書〉（1919 年 11 月 5 日），收於丁文江、趙豐田：《梁啟超年譜長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年），頁 573。

<sup>48</sup> 梁啟超：《梁任公近著》第 1 輯（上卷），收於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 53 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78 年），頁 3。

果二：「一曰人之發現，二曰世界之發現」。意者百里之得「曙光」，其亦新有所發現於此二者耶？<sup>49</sup>

蔣方震心中的「曙光」，並不純然出於白黎許氏講座的啟發，而是建立在其一年多的歐遊見聞之上的。歐遊期間，蔣氏撰有多篇遊歐隨筆和學術論文，<sup>50</sup>包括：異域見聞（如〈抵英雜感〉、<sup>51</sup>〈倫敦一瞥記〉<sup>52</sup>）、戰地遊記（如〈巡視歐洲西戰場記〉、<sup>53</sup>〈重遊戰地續記〉<sup>54</sup>）、軍事理論（如〈德國戰敗之諸因〉、<sup>55</sup>〈蔣百里先生論裁兵〉<sup>56</sup>）等，故他筆下的文藝復興並不是一個與現實無干的歷史時期，而與歐戰、法國革命、政治改革相關聯。蔣氏自言其《歐洲文藝復興史》「或者於今日之所謂文化運動者，有一得之助」，<sup>57</sup>在這裡，蔣方震試圖以西方歷史助益當下中國，借助以「西」釋「中」的學術方式，表達「五四」這一「激變時代」<sup>58</sup>的時代特質和文化精神。

## （二）梁啟超：「由復古而得解放」

在 20 世紀初，梁啟超對「文藝復興」的思考，前後持續了近 20 年。

- <sup>49</sup> 梁啟超：〈《歐洲文藝復興史》序〉，收於蔣方震《歐洲文藝復興史》，頁 1-2。
- <sup>50</sup> 統計目錄參見拙作：〈還原現場：異域旅行與《歐遊心影錄》的寫作〉，《漢語言文學研究》2013 年第 1 期（2013 年 3 月），頁 69。
- <sup>51</sup> 蔣方震：〈抵英雜感〉，《晨報》第 2 版，1919 年 4 月 8 日。
- <sup>52</sup> 蔣方震：〈倫敦一瞥記〉，《國民公報》第 5 版，1919 年 4 月 29 日。
- <sup>53</sup> 蔣方震：〈巡視歐洲西戰場記〉，《晨報》第 7 版，1919 年 6 月 19 日-1919 年 6 月 22 日；第 5 版，1919 年 6 月 23 日；第 7 版，1919 年 6 月 24 日-1919 年 6 月 27 日，其中 6 月 19 日標題作〈巡遊西歐戰場記〉，因《國民公報》6 月 20 日-6 月 27 日均作《巡視歐洲西戰場記》，故據此統一。
- <sup>54</sup> 蔣方震：〈重遊戰地續記〉，《國民公報》第 2 版，1919 年 8 月 6 日-1919 年 8 月 7 日。其中 7 日標題作〈重遊戰地記〉。
- <sup>55</sup> 梁啟超：《梁任公近著》第 1 輯（上卷），頁 186-194。
- <sup>56</sup> 蔣方震：〈蔣百里先生論裁兵〉，《國民公報》第 2 版，1919 年 9 月 6 日。
- <sup>57</sup> 蔣方震：〈導言〉，《歐洲文藝復興史》頁 8。
- <sup>58</sup> 羅志田：《激變時代的文化與政治——從新文化運動到北伐》（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年）。

其以清學比附近世歐洲的「以復古為解放」之說，成為「中國文藝復興」的代表論說之一。早在 1902 年，梁氏在〈論學術之勢力左右世界〉中，即將希臘古學復興作為歐洲近世文明先導的兩個原因之一；<sup>59</sup> 在同年的〈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學說〉緒言中，更言：「近世史與上世中世特異者不一端，而學術之革新，其最著也。有新學術，然後有新道德、新政治、新技藝、新器物。有是數者，然後有新國、新世界。」<sup>60</sup> 文中援引嚴復論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笛卡爾（René Descartes，1596-1650）之說，進一步提出「惟培根與笛卡兒，顧宗教今已屬末法之期，而學術則如旭日升天，方興未艾」。<sup>61</sup> 這樣的認識和「新國、新世界」的期許，顯示了梁啟超的早期文藝復興觀。兩年之後，梁氏補寫《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將原擬〈衰落時代〉易名為〈近世之學術〉，並將「今日」定名為「復興時代」。<sup>62</sup> 其論及清代學術時言：

此二百餘年間，總可命為「古學復興時代」。特其興也，漸而非頓耳。然固儼然若一有機體之發達，至今日而葱葱鬱鬱，有方春之氣焉。吾於我思想界之前途，抱無窮希望也。<sup>63</sup>

1904 年，「古學復興」作為“Renaissance”最常用的漢譯名稱，出現在梁氏文中，當有中西對照之意。比較兩年前他對歐洲近世文明的述說，其對清學的「無窮希望」，實與之相類似。其「對於『中國學術思想』的評價討論，和他當時對於西方文化的認識，有密切的關係，對於西方的認

<sup>59</sup> 梁啟超：《飲冰室文集之六》，頁 111，收於林志鈞編：《飲冰室合集·文集》第 3 冊（上海：中華書局，1936 年），頁 571。

<sup>60</sup> 梁啟超：《飲冰室文集之十三》，頁 1，收於林志鈞編：《飲冰室合集·文集》第 5 冊（上海：中華書局，1936 年），頁 1119。

<sup>61</sup> 梁啟超：《飲冰室文集之十三》，頁 1，收於林志鈞編：《飲冰室合集·文集》第 5 冊，頁 1119。

<sup>62</sup> 梁啟超撰，夏曉虹導讀：《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頁 100。

<sup>63</sup> 梁啟超撰，夏曉虹導讀：《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頁 134。



知／知識，構成了他理解／詮釋『中國學術思想』的知識狀況（intellectual conditions）。<sup>64</sup> 梁氏的西學閱讀，「賦予他打量世界的新眼光，而這種眼光是在整體地把握學術流變時不可缺少的」。<sup>65</sup> 西學的助力，使梁氏早期的清學研究即已有了在比較基礎上的思考。

在《歐遊心影錄》的寫作中，梁啟超述及歐洲文學的文藝復興時期，稱之為「當文明萌茁之時，覺得前途希望汪洋無際」。<sup>66</sup> 歸國後，1920年，梁啟超由「文藝復興者，由復古得解放也。果爾，吾前清一代，亦庶類之。吾試言吾國之文藝復興而校其所以不如人之故」<sup>67</sup> 為蔣方震作序，寫成《清代學術概論》。在〈自序〉中，梁氏自引《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之語，並將「古學復興時代」易為「中國之『文藝復興時代』」。<sup>68</sup> 任公自稱「余今日之根本觀念，與十八年前無大異同」，<sup>69</sup> 他這一以清學比於文藝復興的思考，至此已有十餘年的醞釀。

歐遊歸來，蔣方震在寫作過程中即與梁啟超書信往來討論，<sup>70</sup> 書成更是啟發了梁氏對清代學術研究思路的新面向。「由復古而得解放，由主觀之演繹進而為客觀之歸納，清學之精神，與歐洲文藝復興，實有同調者焉」，<sup>71</sup> 由蔣方震之文與中西對照所感，梁啟超論述了他所思考的「中國

<sup>64</sup> 潘光哲：〈畫定「國族精神」的疆界——關於梁啟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的思考〉，收於徐興慶編：《東亞知識人對近代性的思考》（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9年），頁304-305。

<sup>65</sup> 徐雁平：〈《清代學術概論》考論〉，《中國典籍與文化論叢》第8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頁283。

<sup>66</sup> 梁啟超：《梁任公近著》第1輯（上卷），頁23。

<sup>67</sup> 梁啟超：〈《歐洲文藝復興史》序〉，收於蔣方震：《歐洲文藝復興史》，頁1。

<sup>68</sup> 梁啟超：〈自序〉，梁啟超撰，朱維錚導讀：《清代學術概論》，頁1。

<sup>69</sup> 梁啟超：〈自序〉，梁啟超撰，朱維錚導讀：《清代學術概論》，頁2。按，《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中〈近世之學術〉一節實為1904年補寫，故應是十六年。朱維錚：〈《清代學術概論》導讀〉有論述，見頁23-24。但若追溯到1902年的兩篇文章，言十八年也未為不可。

<sup>70</sup> 如蔣方震1920年6月28日和7月2日兩封〈致任師書〉均提及「《文藝復興史》已成一半」，後一函另向梁氏借日文書。丁文江、趙豐田：《梁啟超年譜長編》，頁586。

<sup>71</sup> 蔣方震：〈《清代學術概論》序〉，收於梁啟超撰，朱維錚導讀：《清代學術概論》，頁109。

之文藝復興」。

在梁氏《清代學術概論》中，論及「文藝復興」計為 8 處，<sup>72</sup> 成為貫穿整本書的潛在線索。其中有的固為對蔣書的直接引用，但更多的則是進一步的闡發。例如，梁氏由蔣所言「一則復希臘羅馬之古，……此則文藝復興也；一則復耶穌之古，……此則宗教改革也」一段，直錄為「蔣方震曰：『歐洲近世史之曙光，發自兩大潮流。其一，希臘思想復活，則「文藝復興」也；其二，原始基督教復活，則「宗教改革」也』」；<sup>73</sup> 而進一步借此思路將清「二百餘年之學史」演繹為「以復古為解放」：

第一步，復宋之古，對於王學而得解放。第二步，復漢唐之古，對於程朱而得解放。第三步，復西漢之古，對於許鄭而得解放。第四步，復先秦之古，對於一切傳注而得解放。<sup>74</sup>

對此，丘為君根據梁氏的「理學反動說」，將「以復古為解放」評為「在梁氏的系統裡，清代學術思想進程的動力是『反動』，其手段在於『復古』，其目的是『解放』——包括形式的解放與內容的解放」。<sup>75</sup> 與清儒論學辯析禮、理，研討漢、宋的傳統思路不同，「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跳脫『漢學』與『宋學』彼此爭伐攻訐的立場，述說清代學術思想的大體經脈，自是揮灑出與眾不同的思想圖像」。<sup>76</sup> 在章太炎、劉師培之後，梁啟超的學術史書寫建立在更為廣闊的西學閱讀和異域經歷基礎上，反觀清代學術，超越傳統學術視野的高度，提出更具現代化眼光的話題與論斷。其中，最具時代意義的論說之一，還是圍繞「科學」。

<sup>72</sup> 徐雁平對此有詳細梳理，見徐雁平：〈《清代學術概論》考論〉，收於中國典籍與文化編輯部編：《中國典籍與文化論叢》第 8 輯，頁 299-300。

<sup>73</sup> 梁啟超撰，朱維錚導讀：《清代學術概論》，頁 100。

<sup>74</sup> 梁啟超撰，朱維錚導讀：《清代學術概論》，頁 7。

<sup>75</sup> 丘為君：〈清代思想史「研究典範」的形成、特質和義涵〉，《清華學報》第 24 卷第 4 期（1994 年 12 月），頁 454-455。

<sup>76</sup> 潘光哲：〈《清代學術概論》導讀〉，收於梁啟超著，潘光哲導讀：《清代學術概論》，頁 32。

被稱為「賽先生」的科學，是五四時代最為新潮的話題。不過，早在1904年，梁啟超在補寫《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時，即已用「科學」作為標尺來評判清代學術，提出「本朝學者以實事求是為學鵠，頗饒有科學的精神」。他認為清學的研究方法實為「學界進化之一徵兆」，「近世各種科學所以成立之由，而本朝之漢學家皆備之」。<sup>77</sup>對於「科學的精神」，梁啟超定義為：

善懷疑，善尋問，不肯妄徇古人之成說與一己之臆見，而必力求真是真非之所存，一也。既治一科，則原始要終，縱說橫說，務盡其條理，而備其左證，二也。其學之發達，如一有機體，善能增高繼長，前人之發明者，啟其端緒，雖或有未盡，而能使後人因其所啟者而竟其業，三也。善用比較法，臚舉多數之異說，而下正確之折衷，四也。<sup>78</sup>

旅美歸來的梁啟超在此強調清學研究中科學的精神，凸顯了其「研治國學的西學背景」。<sup>79</sup>十五年後，歐遊一舉，更是開拓了他的視野，使他對西方文化有了更為深刻的瞭解和認識。

梁啟超一行抵歐時，一戰剛剛過去，這場歷時4年、33國參戰、造成千萬餘人死亡的浩劫，成為一時代的劇痛和夢魘。1918年7月，四年大戰的轉折之時，斯賓格勒（Oswald Spengler, 1880-1936）《西方的沒落》（*Der Untergang des Abendlandes*）一書出版。它不啻為一戰時期歐洲思想界的一顆炸彈，因為它「想去預斷歷史，想在一種文化的命運中去追蹤尚未被人涉足過的各個階段，尤其是我們的時代和我們的地球上那唯一實際上已處於完成狀態的文化的各個階段，那就是西歐及美洲文化」，<sup>80</sup>並直

<sup>77</sup> 梁啟超撰，夏曉虹導讀：《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頁113。

<sup>78</sup> 梁啟超撰，夏曉虹導讀：《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頁113。

<sup>79</sup> 夏曉虹：〈前言〉，收於梁啟超撰，夏曉虹導讀：《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頁14。

<sup>80</sup> 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Oswald Spengler）著，吳瓊譯：《西方的沒落》（北京：三聯書店，2006年），頁1。

言「西方的沒落」。19世紀的歐洲神話解構，人們不免陷入時代的悲觀主義之中。梁啟超一行所見，正是經歷了浩劫的歐洲。昔日「日不落帝國」的神話已然被「要煤沒煤，要米沒米，家家戶戶開門七件事，都要繃起眉頭來」<sup>81</sup>的現實所衝破，悽惶失望中，實地見證引發出時代的思考。梁氏感慨「歐洲人做了一場科學萬能的大夢，到如今卻叫起科學破產來」，雖自注「讀者切勿誤會，因此菲薄科學，我絕不承認科學破產，不過也不承認科學萬能罷了。」<sup>82</sup>但「科學破產」的提法，還是在新文化運動背景下的中國引起軒然大波，<sup>83</sup>《歐遊心影錄》「世界末日，文明滅絕」<sup>84</sup>的筆調，讓一些人認為梁啟超對歐洲文明、科學產生了懷疑與菲薄之心。其實，書中同時還有完全相反的態度，如對「歐洲不是整個完了嗎」這一問題的決然回答：

他的文明，是建設在大多數人心理上，好像蓋房子從地腳修起，打了個很結實的樁兒，任憑暴風疾雨，是不會搖動的。……  
……我對於歐洲，覺得他前途雖然是萬難，卻斷不是墮落。<sup>85</sup>

誠然，《歐遊心影錄》在論述中不乏自相矛盾之處，一方面絕不承認科學破產，一方面自言「科學到底有多少進步，卻成疑問」。<sup>86</sup>其對「科學萬能」的否定，使得人們對「賽先生」有了更多理性思考；「歐美歸來，折衷孔子」的文化觀轉變，「外挽頹波，內補夙愆」<sup>87</sup>的實際行動，也體現了梁啟超晚年在此影響下的文化選擇。其在《清代學術概論》中重申「清

<sup>81</sup> 梁啟超：《梁任公近著》第1輯（上卷），頁6。

<sup>82</sup> 梁啟超：《梁任公近著》第1輯（上卷），頁23。

<sup>83</sup> 胡適：〈《科學與人生觀》序〉，收於張君勳等：《科學與人生觀》（合肥：黃山書社，2008年），頁9-11。

<sup>84</sup> 梁啟超：《梁任公近著》第1輯（上卷），頁28。

<sup>85</sup> 梁啟超：《梁任公近著》第1輯（上卷），頁30-31、36。

<sup>86</sup> 梁啟超：《梁任公近著》第1輯（上卷），頁84。

<sup>87</sup> 張榮華編校：《康有為往來書信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663。

儒之治學，純用歸納法，純用科學精神」，<sup>88</sup> 隨後在演說講學中也強調「科學精神」、「科學方法」。<sup>89</sup> 胡適所言說的「清代的『樸學』確有『科學』的精神」，<sup>90</sup> 也與梁氏一脈相承。<sup>91</sup>

「歐洲文藝復興，固由時代環境所醞釀，……清學之在全盛期也亦然」，<sup>92</sup> 雖中國前清與歐洲文藝復興有諸多不同，以至於曹聚仁提出「把清代三百年的學術思潮，比附之於歐洲文藝復興運動，我個人總以為大可不必」，<sup>93</sup> 但「中國的文藝復興」這一話題，對於歐遊期間的梁啟超，仍有特別的意義。西方的文藝復興是對中世紀黑暗時代的告別，而在梁啟超心目中，清代中國學術的復興，未嘗不是民族「曙光」的展現。雖然前清之「文學美術不發達」，<sup>94</sup> 但「清代學術，在中國學術史上價值極大」，<sup>95</sup> 未嘗不能與歐洲文藝復興之文化遺產相媲美。清學之盛，所代表的文化傳承，與歐洲之「返於希臘」，同有復古求真之理念。梁啟超在英國演說「中國之文藝復興」，<sup>96</sup> 與其日後弘揚國故、<sup>97</sup> 潛心學術，有著內在的聯繫和配合。

<sup>88</sup> 梁啟超撰，朱維錚導讀：《清代學術概論》，頁 62。

<sup>89</sup> 梁啟超：〈科學精神與東西文化〉、〈治國學的兩條大路〉，《飲冰室文集之三十九》，頁 3、111，收於林志鈞編：《飲冰室合集·文集》第 14 冊（上海：中華書局，1936 年），頁 3737、3845。梁啟超否定「科學萬能」不意味著反對科學，只是歐遊歸國後，他採取分而治之的做法，以西方科學精神治理文獻的學問，以東方的人生哲學治理德性的學問。感謝夏曉虹教授之提示。

<sup>90</sup> 胡適：〈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收於胡適著，陳平原編校：《中國現代學術經典：胡適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年），頁 719。

<sup>91</sup> 潘光哲對此有細緻的比較。見潘光哲：〈《清代學術概論》導讀〉，收於梁啟超著，潘光哲導讀：《清代學術概論》，頁 25。

<sup>92</sup> 梁啟超撰，朱維錚導讀：《清代學術概論》，頁 66。

<sup>93</sup> 曹聚仁：〈文藝復興時代的典型人物〉，《蔣百里評傳》，頁 8。

<sup>94</sup> 梁啟超撰，朱維錚導讀：《清代學術概論》，頁 101。

<sup>95</sup> 梁啟超撰，朱維錚導讀：《清代學術概論》，頁 102。

<sup>96</sup> 丁文江、趙豐田：《梁啟超年譜長編》，頁 569。根據 1919 年 6 月 16 日〈與嫻兒書〉，梁啟超計畫 6 月 23 日在英國文學會歡迎會發表該演說。目前文本尚未能得見，唐小兵也言“no text of this speech is available”。Xiaobing Tang, *Global Space and the Nationalist Discourse of Modernity: The Historical Thinking of Liang Qichao*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267.

<sup>97</sup> 梁啟超：〈治國學的兩條大路〉，《飲冰室文集之三十九》，頁 110-119，收於林志鈞編：《飲冰室合集·文集》第 14 冊，頁 3844-3853。

### （三）張君勱：對「以西釋中」的反思

1964年11月4日，張君勱在演說〈評梁任公《清代學術概論》中關於歐洲文藝復興、宋明理學、戴東原哲學三點〉中，一方面論述「儒家思想之復興」，一方面對梁啟超「文藝復興」說做出了自己的評判。由「歐洲文藝復興，以反宗教為主要關鍵」，「復古二字作為歐洲文藝復興之內容，其名稱已不免太狹」，「所以不能以復古二字，為其二者之公分母」，進而由歐洲的文學美術、科學探究、宗教改革和民族國家四點，得出「歐洲文藝復興與清代之古籍考證學是不相同的」之結論。張君勱以清代考證學與歐洲文藝復興的背景不同、方法不同、發展情形不同，反對二者的類比，並提出「五四以來不將科學方法作為限於自然科學之方法，而以之與文字考證學方法混而同之，是一項錯誤」，進而批評「拿幾個外國的名詞來，隨便套上，要藉此以鼓勵國人對科學之興趣」<sup>98</sup>的做法是行不通的。張君勱注意到文藝復興後西方物理學、數學的試驗和計算方法與清學的文字考證不可等量齊觀，不能以「科學」之名混同中西學術的差異，這可視為對晚清以來以「西」釋「中」思路的一種反思。不過，張君勱反對將清代的考據學、金石、天文、星算、曆法、地理等與歐洲文藝復興之文學科學發展相類，則同樣存在偏頗。一方面，確如張氏所言，古代名物研究與現代科學發展不可同日而語，單以「科學」混同二者實不恰當；另一方面，張氏所言的清代天文、曆法、地理等學，還是受到明清來華傳教士所帶來的西方新學的巨大影響，清代的科學精神和經世思潮，並非純然來源於中土的復古學說，其更多的思想資源，還是源自文藝復興以來的歐洲。

歐遊期間，張君勱撰有十餘篇政論文，析論外交國是，剖析闡釋西國憲法、政黨的歷史與將來（如〈英屬馬來及海外中華民族之前途〉、<sup>99</sup>〈中

<sup>98</sup> 張君勱：〈評梁任公《清代學術概論》中關於歐洲文藝復興、宋明理學、戴東原哲學三點〉，收於張君勱著，程文熙編：《中西印哲學文集（下）》，頁832-834。

<sup>99</sup> 張君勱：〈英屬馬來及海外中華民族之前途〉，《晨報》第2版，1919年2月12日。

國在和會中所得之教訓》、<sup>100</sup>〈英國之將來〉、<sup>101</sup>〈外交與國是〉<sup>102</sup>等），在危局中「惘惘而悲」，<sup>103</sup>時時呼籲「吾國人其速起而圖之」。<sup>104</sup>比較張、蔣二人的歐遊隨筆，張側重政治經濟，蔣側重個人見聞和異域風俗。例如，二人都有錫蘭島遊記（張君勳〈錫蘭島聞見〉<sup>105</sup>，蔣方震〈歐遊通信（三）〉<sup>106</sup>），張君勳歷數錫蘭島人種居所、重要物產、政府事務，而蔣方震詳述舟中經驗和錫蘭島之「林百全」，風格與張截然不同。由歐遊中的文字，已不難理解他們在經歷同一見聞後思想上的差異，故同是一戰之後遊歐，同聽過白黎許氏之演說，張君勳卻提出了和蔣方震、梁啟超相反的結論也並非一時之意。事實上，從歐遊歸來後 1920 年代的「科玄論戰」，已能見出張氏思想的趨向。而 1964 年，張君勳是站在 40 餘年後的立場上回顧那場討論，此時他的思想也已不同於其彼時從社會科學轉到哲學，「決心把我所藏國際法書付諸一炬」，轉而從倭伊鏗（Rudolf Christoph Eucken, 1846-1926）讀書，「決心探求一民族所以立國之最基本的力量」<sup>107</sup>的心境，在哲學研究上走了更遠。在後來者的角度，張氏所言確有道理，中西文化交流，終究要從簡單的嫁接比附走向更成熟的理性對讀。然而，我們也不能否認，在眾聲喧嘩的民初，梁氏更有卓識。他認識到了戴震「以『情感哲學』代『理性哲學』」背後的近代意識，由其「研究法的運動」，稱其「與歐洲文藝復興時代之思潮本質絕相類」；<sup>108</sup>他注意到「水地天算」

<sup>100</sup> 張君勳：〈中國在和會中所得之教訓〉，《國民公報》第 5 版，1919 年 7 月 5 日。

<sup>101</sup> 張君勳：〈英國之將來〉，《解放與改造》第 1 卷第 4 號，1919 年 10 月 15 日，頁 8-15。

<sup>102</sup> 張君勳：〈外交與國是〉，《國民公報》第 5 版，1919 年 10 月 21 日。

<sup>103</sup> 張君勳：〈英國外交政策觀〉，《國民公報》第 5 版，1919 年 8 月 5 日。

<sup>104</sup> 張君勳：〈巴黎和會中吾國外交之經過及其致敗原因（三續）〉，《國民公報》第 2 版，1919 年 7 月 12 日。

<sup>105</sup> 張君勳：〈錫蘭島聞見〉，《晨報》第 2 版，1919 年 3 月 28 日。

<sup>106</sup> 蔣方震：〈蔣百里先生之遊歐通信（三）〉，《國民公報》第 5 版，1919 年 2 月 25 日。

<sup>107</sup> 張君勳：〈我從社會科學跳到哲學之經過〉，《再生》第 3 卷第 8 期，1935 年 10 月，頁 7。

<sup>108</sup> 梁啟超撰，朱維錚導讀：《清代學術概論》，頁 41-43。

之學所受到的西學影響，「茲學中國發源甚古，而光大之實在清代，學者精研虛受，各有創獲，其於西來法，食而能化，足規民族器量焉」。<sup>109</sup> 雖「清代自然科學不發達」，然而此一時代對西學的接受已經遠遠超越前朝，清代士人的西學閱讀，任公對自己身後巨變時代的觀察，都不應被歷史忽視。

### 三、文友會上的討論：胡適、王克私與丁文江的 「文藝復興」觀

20世紀初，在「中國的文藝復興」這個話題下，學人之間彼此問難，互相影響，形成了良性的學術互動。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的寫作肇始於蔣方震的刺激和胡適的影響，<sup>110</sup> 與此同時，梁啟超對清代學術變遷的判斷，也影響了胡適對該論題的評價。胡適出版於1919年的《中國哲學史大綱》言：

綜觀清代學術變遷的大勢，可稱為古學昌明的時代。自從有了那些漢學家考據、校勘、訓詁的工夫，那些經書子書，方才勉強可以讀得。這個時代，有點像歐洲的「再生時代」。（再生時代西名Renaissance，舊譯文藝復興時代。）歐洲到了「再生時代」，昌明古希臘的文學哲學，故能推翻中古「經院哲學」（舊譯煩瑣哲學，極不通。原文為Scholasticism，今譯原義）的勢力，產出近世的歐洲文化。我們中國到了這個古學昌明的時代，不但有古書可讀，又恰當西洋學術思想輸入的時代，有西洋的新舊學說可供我們的參考研究。我們今日的學術思想，有這兩個大源頭：一方面是漢學家傳

<sup>109</sup> 梁啟超撰，朱維錚導讀：《清代學術概論》，頁57。

<sup>110</sup> 潘光哲：〈《清代學術概論》導讀〉，收於梁啟超著，潘光哲導讀：《清代學術概論》，頁5。



給我們的古書；一方面是西洋的新舊學說。<sup>111</sup>

胡適在這裡同樣以清學與西學對舉，以「漢學家的古書」和「西洋的新舊學說」並列，強調西洋學術思想的輸入對古學昌明的影響。不過，與梁啟超相比，胡適的「文藝復興」觀多次變動，不斷發展，一直延續到晚年，使其成為 20 世紀「中國文藝復興」說的代言人。

胡適 1917 年 6 月 19 日讀薛謝兒女士 (Edith Sichel, 1862-1914) 的《再生時代》(The Renaissance) 一書，是其關注這一論題的起點。「『再生時代』者，歐史十五、十六兩世紀之總稱，舊譯『文藝復興時代』。吾謂文藝復興不足以盡之，不如直譯原意也」。<sup>112</sup> 其後，他在日記、演講、口述自傳中，屢屢述說。<sup>113</sup> 根據本文第一節，1917 年時「文藝復興」作為“Renaissance”的部定漢譯名，使用時間還不長；而胡適本人對「再生時代」的譯法也未久持，雖 1919 年曾再次重申，然數年後即已接受「文藝復興」的譯法。<sup>114</sup>

在二十世紀初，「中國的文藝復興」有多種指稱，不同的「文藝復興說」在當時也有碰撞，例如胡適 1922 年 2 月 15 日記述：

夜赴文友會，會員 Philip de Vargas 讀一文論“Some Aspects of the Chinese Renaissance”；<sup>115</sup> 我也加入討論。在君說“Chinese Renaissance”一個名詞應如梁任公所說，只限於清代的漢學，不當包括近年的文

<sup>111</sup> 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上海：商務印書館，1919 年），頁 9。

<sup>112</sup> 胡適：《胡適留學日記（下）》（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年），頁 367。

<sup>113</sup> 潘光哲：〈「重新估定一切價值」——「胡適研究」前景的一些反思〉，收於：胡適著，潘光哲編：《容忍與自由：胡適讀本》（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 年），頁 241。

<sup>114</sup> 胡適日記 1923 年 4 月 3 日：「用英文作一文，述『中國的文藝復興時代』（“The Chinese Renaissance”）」。胡適著，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 4（1923-1927）》（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 年），頁 7。

<sup>115</sup> Philippe de Vargas, “Some Elements in the Chinese Renaissance,” *The New China Review* 4, no. 2 (1922): 115-127; 4, no. 3 (1922): 234-247. 作者按：經過查證，王克私名為 Philippe de Vargas (1888-1956)，此處為胡適筆誤。

學革命運動。我反對此說，頗助原著者。其實任公對於清代學術的見解，本沒有定見。<sup>116</sup>

這次討論，反映了胡適、王克私（Philip de Vargas，1888-1956）、丁文江之間的學術互動，一晚的論辯，實際折射出他們醞釀已久的思考。對於這次文友會，羅志田、李貴生等文都有詳論。<sup>117</sup>「如果回到中國文藝復興『時代』的意義上，王克私與其他中國人的最大不同是他之所論僅限於新文化運動，而不及清代學術／思想」。<sup>118</sup>王克私由《新潮》雜誌的英文名“Renaissance”，將中國的五四新思潮與新文化運動稱作“China Renaissance”。胡適在此支持王克私的觀點，反對梁啟超的清學比附。然而，在這次文友會一年之後，胡適在日記中，實認為王克私該文「雖得我的幫助，實不甚佳」，<sup>119</sup>進而提出自己對中國「文藝復興時期」的分期判斷，以宋代作為中國「文藝復興時期」的開端。<sup>120</sup>

丁文江曾隨梁啟超遊歐，但他並未全程陪同任公。1919年5月15日，他離開巴黎去諾曼底，<sup>121</sup>6、7月間遊瑞典，<sup>122</sup>7月30日起程赴美離開「考察團」，<sup>123</sup>故白黎許氏的演講，他可能不在現場。不過，丁文江在此支持梁啟超之說，與其次年在「科玄論戰」中的立場還是一致的。丁文江與胡適觀點的相左，實際反映的是此時胡適已經走出了《中國哲學史大綱》時期的觀點，他對清學的態度，已經和梁啟超有了很大的不同。其中固有

<sup>116</sup> 胡適著，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3（1919-1922）》（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頁558。

<sup>117</sup> 羅志田：〈中國文藝復興之夢：從清季的古學復興到民國的新潮〉，頁295-297；李貴生：〈論胡適中國文藝復興論述的來源及其作用〉，《漢學研究》第31卷第1期（2013年3月），頁235-236。

<sup>118</sup> 羅志田：〈中國文藝復興之夢：從清季的古學復興到民國的新潮〉，頁297。

<sup>119</sup> 胡適著，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4（1923-1927）》，頁7。

<sup>120</sup> 胡適著，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4（1923-1927）》，頁7。

<sup>121</sup> 宋廣波：《丁文江年譜》（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09年），頁138。

<sup>122</sup> 馬思中、陳星燦：《中國之前的中國：安特生、丁文江和中國史前史的發現》（斯德哥爾摩：東方博物館，2004年），頁20。

<sup>123</sup> 顏惠慶：《顏惠慶日記（第一卷）·1919年7月29日》（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1996年），頁891。

1920年代胡梁競爭心態的影響，二人「在學術上常有對壘的情況發生」，<sup>124</sup>但縱觀胡適日後對此話題的歷次述說，可見他在中西文化對照思考的道路上，最終選擇了與任公不同的方向。

#### 四、結語

「『中』與『西』對比參照的述說風氣，可以說是二十世紀之初學界同潤共享的」。<sup>125</sup> 學人的西學閱讀，擴展了對世界的認知，進而構成他們生產中國化的新知識的基礎原料。以「西」釋「中」，借西方概念來闡述中國傳統，借歐洲經驗以反觀自身，是一種比附，也是一種再創造。以「文藝復興」論清學復古，不是嚴復或梁啟超的私人創造，而是彰顯了清末民初西學衝擊下的時代風氣與士人心態。爬梳晚清西學閱讀中的“Renaissance”，以這個「總括性概念」的中國化作為窗口，管窺國人文化關注轉移背後的觀念和思想變遷，也可作為近代「西史東漸」和知識空間研究的一例。同時，近代學人群體圍繞「文藝復興」的學術互動，對「以西釋中」範式的採用或批駁，體現了西潮中士人的文化選擇。時至今日，清末民初引入中國的西方知識譜系已顯過時，然而，這樣以「西」釋「中」的思維方式在近代中國留下的概念述說與學術建構，仍具有重要的思想價值。

周作人曾將「文藝復興」稱為中國人的一個夢，「吾輩固無日不在夢想中」。<sup>126</sup> 1905年，鄧實言「十五世紀，為歐洲古學復興之世，而二十世紀，則為亞洲古學復興之世」，<sup>127</sup> 代表了20世紀初中國學人的未來展

<sup>124</sup> 張朋園：〈胡適與梁啟超——兩代知識分子的親和與排拒〉，《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5卷下期（1986年12月），頁93。

<sup>125</sup> 潘光哲：〈畫定「國族精神」的疆界——關於梁啟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的思考〉，收於徐興慶編：《東亞知識人對近代性的思考》，頁317。

<sup>126</sup> 知堂：〈文藝復興之夢〉，《求是》第1卷第3號，1944年5月，頁1-3。

<sup>127</sup> 鄧實：〈古學復興論〉，收於劉東、文韜編：《審問與明辨：晚清民國的「國學」論爭》上冊，頁141。

望。艾爾曼（Benjamin A. Elman）認為「17、18世紀歷史不僅是儒教中國衰亡的前奏，也是新時代即將來臨的序曲」，<sup>128</sup> 清學復古不是學術上的懷舊，其旨仍在呼喚「葱葱鬱鬱」的「方春之氣」；而這種面向未來的期望，和以五四新文化運動比附文藝復興又是類似的。雖然對於後者，先是李長之提出五四運動「並非文藝復興，乃是一種啟蒙運動」，<sup>129</sup> 繼而余英時提出五四「既非文藝復興，亦非啟蒙運動」，<sup>130</sup> 然此討論本身，仍是一種西學閱讀體驗中的文化觀照。在百餘年之後，回望這一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轉型時代」，沐浴西風的讀書人反觀自身文明，熱切呼喚中國的啟蒙與再生，雖嫁接式的比附不無失當之處，但這場曠日持久的學術互動，帶來重新估價中國學術的現代力量，其背後的文化價值，仍待繼續發掘。

<sup>128</sup> 艾爾曼（Benjamin A. Elman）著，趙剛譯：《從理學到樸學——中華帝國晚期思想與社會變化面面觀》（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年），頁4。

<sup>129</sup> 李長之：《迎中國的文藝復興》（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年），頁30-41。

<sup>130</sup> 余英時：〈文藝復興乎？啟蒙運動乎？一個史學家對五四運動的反思〉，收於余英時等：《五四新論——既非文藝復興，亦非啟蒙運動》（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9年），頁1-31。

## 徵引書目

- (作者不詳)：〈論女子教育宗旨〉，《申報》第1、2版，1905年6月11日。  
《申報》影印本第80冊，上海：上海書店，1985年，頁364-365。
- 丁文江、趙豐田：《梁啟超年譜長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 王棊主編：《嚴復集》第5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
- 王富仁：《中國的文藝復興》，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年。
- 王曉平：《東亞文學經典的對話與重讀》，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年。
- 丘為君：〈清代思想史「研究典範」的形成、特質和義涵〉，《清華學報》第24卷第4期，1994年12月，頁451-494。
- 早稻田文學社編：《文芸百科全書》，東京：隆文館，1909年。
- 艾爾曼 (Benjamin A. Elman) 著，趙剛譯：《從理學到樸學——中華帝國晚期思想與社會變化面面觀》，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年。
- 李長之：《迎中國的文藝復興》，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年。
- 李長林：〈歐洲文藝復興文化在中國的傳播〉，收於鄭大華、鄒小站編：《西方思想在近代中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頁1-48。
- 李貴生：〈論胡適中國文藝復興論述的來源及其作用〉，《漢學研究》第31卷第1期，2013年3月，頁219-254。
- 余英時：〈文藝復興乎？啟蒙運動乎？一個史學家對五四運動的反思〉，收於余英時等：《五四新論——既非文藝復興，亦非啟蒙運動》，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9年，頁1-32。
- 宋雪：〈還原現場：異域旅行與《歐遊心影錄》的寫作〉，《漢語言文學研究》2013年第1期，2013年3月，頁51-70。
- 宋廣波：《丁文江年譜》，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09年。
- 沈國威：《近代中日辭彙交流研究：漢字新詞的創制、容受與共享》，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
- 知堂：〈文藝復興之夢〉，《求是》第1卷第3號，1944年5月，頁1-3。
- 孟德斯鳩 (Montesquieu) 著，嚴復譯：《孟德斯鳩法意》，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年。

- 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上海：商務印書館，1919年。
- 胡適：《胡適留學日記（下）》，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
- 胡適著，陳平原編校：《中國現代學術經典：胡適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
- 胡適著，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3（1919-1922）》，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 胡適著，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4（1923-1927）》，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 胡適著，鄒小站、尹飛舟譯：〈中國的文藝復興〉，收於胡適著，歐陽哲生、劉紅中編：《中國的文藝復興》，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1年，頁149-225。
- 胡適著，潘光哲編：《容忍與自由：胡適讀本》，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年。
- 馬君武著，莫世祥編：《馬君武集》，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
- 馬思中、陳星燦：《中國之前的中國：安特生、丁文江和中國史前史的發現》，斯德哥爾摩：東方博物館，2004年。
- 徐雁平：〈《清代學術概論》考論〉，收於中國典籍與文化編輯部編：《中國典籍與文化論叢》第8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頁282-311。
- 徐興慶編：《東亞知識人對近代性的思考》，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9年。
- 章可：〈「古學復興」的兩面：清末西史知識構成之一例〉，收於張仲民、章可編：《近代中國的知識生產與文化政治——以教科書為中心》，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4年，頁189-200。
- 張君勱：〈英屬馬來及海外中華民族之前途〉，《晨報》第2版，1919年2月12日。
- 張君勱：〈錫蘭島聞見〉，《晨報》第2版，1919年3月28日。
- 張君勱：〈中國在和會中所得之教訓〉，《國民公報》第5版，1919年7月5日。
- 張君勱：〈巴黎和會中吾國外交之經過及其致敗原因（三續）〉，《國民公報》第2版，1919年7月12日。
- 張君勱：〈英國外交政策觀〉，《國民公報》第5版，1919年8月5日。

- 張君勱：〈英國之將來〉，《解放與改造》第1卷第4號，1919年10月15日，頁8-15。
- 張君勱：〈外交與國是〉，《國民公報》第5版，1919年10月21日。
- 張君勱：〈我從社會科學跳到哲學之經過〉，《再生》第3卷第8期，1935年10月，頁1-14。
- 張君勱等：《科學與人生觀》，合肥：黃山書社，2008年。
- 張君勱著，程文熙編：《中西印哲學文集（下）》，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1年。
- 張朋園：〈胡適與梁啟超——兩代知識分子的親和與排拒〉，《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5卷下期，1986年12月，頁81-108。
- 張榮華編校：《康有為往來書信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年。
- 曹意強：〈「文藝復興」的觀念〉，收於賀照田主編：《並非自明的知識與思想》，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頁381-430。
- 曹聚仁：《蔣百里評傳》，北京：東方出版社，2010年。
- 梁啟超著，林志鈞編：《飲冰室合集·文集》第3、5、14冊，上海：中華書局，1936年。
- 梁啟超：《梁任公近著》第1輯（上卷），收於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53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78年。
- 梁啟超撰，朱維錚導讀：《清代學術概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 梁啟超撰，夏曉虹導讀：《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 梁啟超著，潘光哲導讀：《清代學術概論》，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12年。
- 陳衡哲：《文藝復興小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26年。
- 彭剛：〈從「敘事實體」到「歷史經驗」——由安克斯密特看當代西方史學理論的新趨向〉，《歷史研究》2009年第1期，2009年2月，頁155-173、192。
- 鄒振環：《西方傳教士與晚清西史東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 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Oswald Spengler）著，吳瓊譯：《西方的沒落》，

- 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6年。
- 愛漢者等編，黃時鑒整理：《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
- 德谷豐之助、松尾勇四郎：《普通術語辭彙》，東京：敬文社，1905年。
- 蔣方震：〈蔣伯里先生之遊歐通信（三）〉，《國民公報》第5版，1919年2月25日。
- 蔣方震：〈抵英雜感〉，《晨報》第2版，1919年4月8日。
- 蔣方震：〈倫敦一瞥記〉，《國民公報》第5版，1919年4月29日。
- 蔣方震：〈巡視歐洲西戰場記〉，《晨報》第7版，1919年6月19日-1919年6月22日；第5版，1919年6月23日；第7版，1919年6月24日-1919年6月27日。
- 蔣方震：〈重遊戰地續記〉，《國民公報》第2版，1919年8月6日-1919年8月7日。
- 蔣方震：〈蔣百里先生論裁兵〉，《國民公報》第2版，1919年9月6日。
- 蔣方震：《歐洲文藝復興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24年。
- 潘光哲：《晚清士人的西學閱讀史（一八三三～一八九八）》，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4年。
- 鄧實：〈古學復興論〉，收於劉東、文韜編：《審問與明辨：晚清民國的「國學」論爭》上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139-144。
- 歐陽哲生：〈十七世紀西方耶穌會士眼中的北京——以利瑪竇、安文思、李明為中心的討論〉，《歷史研究》2011年第3期，2011年6月，頁26-47。
- 鄭師渠：《晚清國粹派——文化思想研究》，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3年。
- 閻若璩：《潛邱劄記》，收於永瑤、紀昀等編纂：文淵閣《欽定四庫全書》，子部十·「雜家類」二「雜考之屬」，第859冊。
- 顏惠慶：《顏惠慶日記（第一卷）》，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1996年。
- 羅志田：〈中國文藝復興之夢：從清季的古學復興到民國的新潮〉，《漢學研究》第20卷第1期，2002年6月，頁277-307。
- 羅志田：《激變時代的文化與政治——從新文化運動到北伐》，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



- Lobscheid, William (羅布存德) 著，企英譯書館增訂：《(商務書館)華英音韻字典集成》，上海：商務印書館，1903年。
- Dougnac, Marie-Thérèse. “Nécrologie: Amédée Britsch: 15 avril 1878-2 février 1960.” *Bulletin d’Informations de l’A.B.F.* 34 (1961): 37-38.
- Febvre, Lucien. “How Jules Michelet Invented the Renaissance.” In *A New Kind of History: From the Writings of Febvre*, edited by Peter Burke, 258-267.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3.
- Ferguson, Wallace K. *The Renaissance in Historical Thought: Five Centuries of Interpretation*.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48.
- Hemeling, Karl.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of the Standard Chinese Spoken Language and Handbook for Translators: Including Scientific, Technical, Modern and Documentary Term*. Shanghai: 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 1916.
- Martin, William A. P. “The Renaissance in China.” *New Englander* 28 (1869): 47-68.
- Tang, Xiaobing. *Global Space and the Nationalist Discourse of Modernity: The Historical Thinking of Liang Qichao*.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 de Vargas, Philippe. “Some Elements in the Chinese Renaissance.” *The New China Review* 4, no. 2 (1922): 115-127.
- \_\_\_\_\_ . “Some Elements in the Chinese Renaissance.” *The New China Review* 4, no. 3 (1922): 234-247.

